

## 导论

“语言是一种符号”，这一命题听上去很容易接受，但仔细一想，却也引发出一个十分复杂的现代学科分类问题。我们知道，语言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符号现象之一，它又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那么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和专家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总的说来，有关语言学与符号学关系的论述可以分为两大种。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是从属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之间是平级关系。

从属关系可以被进一步分成两类。一部分人把符号学看成是包含语言学的母学科，而另一部分人则把语言学看成是包含符号学的母学科。坚持符号学包容语言学的学者人数更多。他们认为，符号的意指活动无所不在，而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也无所不包。既然语言是众多符号现象中的一种，那么专门研究这一现象的语言学理当然是普通符号理论的一个分支。究其根源，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明确指出：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因此，它类似于文字、聋哑语字母表、象征仪式、社交礼节、军事信号等等，只不过语言是这些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把它叫做符号学（Semiology，来自希腊语 semeion “符号”）。符号学将阐明符号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谁也说不清楚它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预先已经确定。语言学仅是这门普遍科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将适用于语言学，语言学也因此获得它在人类知识领域里的确切位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15-16 页。

虽然索绪尔没有就这两门学科的关系作更多的论述，但他作为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之父的地位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后来的学者们纷纷接过索绪尔上面这段话中的暗示，并努力将他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代著名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这样说：“语言学在结构上，而不是在功能上是符号学的一个独立分支，符号学的其余部分研究各种非语言的意指和交际系统。”西比奥克：《符号就是符号》，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 页。为具体说明这一问题，西比奥克列举了以下 10 种意指情形：

- 1) 一位放射学家在某病人的 X 光照片上发现一片阴影，并诊断其为肺癌。
- 2) 一位气象学家察觉到气压的上升，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明日的天气预报。
- 3) 一位人类文化学家注意到某原始部落成员的一组交换礼仪，并由此获得关于该部落的政体、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认识。
- 4) 一位法语老师举起一张画着马的图片，她的美国学生说“horse”，老师摇了摇头，读出“cheval”。
- 5) 一位历史学家看到某位前总统的手迹，并由此而获得关于她的研究对象的新认识。
- 6) 一位克里姆林宫观察家观察到某个政治局委员在五一庆典上与党总书记靠得很近，并由此猜测该委员现在所处的政治地位。
- 7) 在审判时有人拿出相关的指纹作证，被告因此而被判有罪。
- 8) 一位猎人在雪中发现几组由蹄利爪留下的长方形动物足迹，前蹄足迹长 15 厘米，宽 13 厘米，相应的后蹄足迹长 15 厘米，宽 11 厘米，沿途还有柱状的动物粪便，20 到 30 毫米长，15 到 20 毫米粗。猎人猜测在他的前方很可能有一头雄的驼鹿在行走。
- 9) 某人发现一条狗正对着他狂叫，那条狗抬头伸颈，龇牙咧嘴，两只耳朵朝前竖立。这人由

此得出自己面临攻击的结论，并采取躲避行动。

10) 一只雄孔雀向一只等待配偶的雌孔雀开屏，雌孔雀立刻蹲下，交配开始了。

尽管上述情形中的细节(背景、角色及其他要素)各不相同，但西比奥克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同一类事件来处理，因为在所有这些表象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即符号的意指活动(semiosis)。他进一步解释道，符号意指活动的最高层次是人类符号活动(anthroposemiosis)，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使用，这一点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识。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在同物理环境打交道的时候，也离不开符号的功用：低气压和乌云向我们预示暴风雨即将到来，并提醒我们应该对此作好充分准备；某个地点浓烟滚滚，并散发出强大的热浪，表明该地点刚刚发生过一场大火，因而是危险之地，不可轻易出入。其次，世界上任何一种动物都具有他们独特的符号系统。跟人类一样，动物也必须与自己的同类和其他种类相互合作才能生存，而合作又离不开对某种符号的使用。萤火虫利用闪光进行种类内部的“对话”是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这种动物与动物之间通过某种固定的代码传递关于身份、性别、所在地点等多方面信息的活动被称为动物符号活动(zoosemiosis)。按照常规的解释，只要某物起到指代他物的功用，就构成符号意指活动。在上述例子中，雄性孔雀开屏，表示了它想交配的欲望；某人类部落举行特定的社交仪式，标志着该部落的文明进化程度；讲法语的人用“cheval”一词，来指称头部小、面部长、耳朵直立、颈部有鬣、四肢强健、每肢各有一蹄、善跑、尾部生有长毛、性情温驯的牲畜；它们都是符号意指活动，因而属于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参见西比奥克：《符号：符号学导论》，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把符号学看成语言学一部分的说法似乎比较极端，但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却也为数不少，其中包括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按照巴爾特的解释，除人类的自然语言以外，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复杂的符号系统。虽然许多物体(如图片、服装、人的行为方式等)同样具有意指功能，并在现实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它们从来不是以独立系统的身份来运作的。就以视觉对象为例，有许多作品缺乏十分明确的指称，需要附加文字说明来确认或者重复它们的意义。类似的情况在电影、广告、漫画或者新闻摄影中也屡见不鲜。这表明，尽管视觉符号在影视时代所起的作用比过去大得多，但话语仍然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我们想像不出某种能够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图像或物体的所指，因为一旦对物体的意义进行思考，我们就不得不进入语言。既然任何所指都必须在语言中找到对应，那么所指的世界也就等于语言的世界。换句话说，虽然符号学的起点可以是非语言成分，但它迟早还必须通过语言这一环节，或者把语言当作分析其他种类符号的模式，或者将语言视为某一意指活动的组成成分和补充意义。巴尔特据此得出结论：“我们现在必须面对颠倒索绪尔观点的可能性：语言学不是普通符号科学的一部分，甚至不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相反，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巴尔特：《符号学要素》，灯塔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巴尔特坚持语言是进行符号学分析的惟一工具，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这位法国学者在强调语言符号的重要性时却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事实上，非语言符号对语言符号的依赖并不等于语言学应该兼并符号学。此外，时时处处用语言学的概念去描述非语言的符号，还犯有逻格斯中心论(Logos-centrism)或语言中心论的嫌疑，这在当今的民主学术气氛中是不可取的。

与上面谈到的从属关系一样，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平级关系也可以分为两种，即平行关系和交叉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各有专攻，两者相互独立，毫不相干。法国符号学家吉劳(Pierre Guiraud)持的就是这一观点。他在《符号学》一书的开头声称：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系统的科学：各种语言、代码、信号组合，等等。根据这一定义，语言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然而，人们一般都承认语言具有某种特殊和独立的地位，这使得我们能够将符号学定义为对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就是这一定义。吉

劳：《符号学》，鲁德利奇和科根·保罗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 页。

除了吉劳所说的语言在诸种通讯手段中的特殊地位，以往的学术历史也是一部分人将语言学和符号学绝然分开的理由。长期以来，除一些表面的联系以外，这两个学科基本上各行其是，不大相互往来。它们各有自己国际性和地方性的专业组织，每年发表大量的学会通讯、论文、会议文集和学术专著。尽管我们可以分别读到有关语言学或者符号学的作品，但很少有人就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可能联系和共同之处作出专门的论述。在符号学名下发表的著作一般议题广泛，很难被归入某一专门的领域。从食品、时装、算命到动物交际、动觉研究和市场营销，这些课题都属于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但它们似乎与语言或语言学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符号学关注的更多是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领域与语言学没有关系，至少关系不大。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学领域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从事符号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作品又显得十分狭窄和专业，而且它们往往像数学研究那样拘泥于形式的表呈，过分强调公式的换算。这种对语言形式的迷恋使得当代语言学主流远离人类的交际现实，从而激不起以意义研究为本的符号学家的兴趣。不仅如此，无论是语言学研究，还是符号学探索，双方多年来都积累了一整套异常晦涩的专业术语，致使来自另一领域的学者大多都不知其所云，有时甚至连同一领域的学者也常常因为理论背景的差异而无法相互沟通。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隔阂。

应该指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形、义并重是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人文学科的出路，而符号则是形、义结合的基本单位。这种符号意识为沟通语言学与符号学这两门独立学科建构了一座桥梁。下面是托宾 (Yishai Tobin) 的一段话：

目前在甲领域发表的著作大多对乙领域的学者缺乏吸引力。这不利于理解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联系。专门为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同时写的书籍数量非常有限，它们也不一定着重讨论语言学与符号学的联系，换句话说，它们不着重讨论符号这一语言学与符号学分析的共同单位。因此，有必要写一本完全以符号为中心的论著，以沟通这两门相关的学科。托宾：《符号学与语言学》，朗文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8 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不少语言学工作者开始将符号学视角引入他们的研究。他们或者以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 的符号类型学说为基础，重新划分语句结构、文本种类及许多其他语言学范畴，或者直接采纳莫里斯 (Charles Morris) 的著名符号学模式，将语言研究分为句法学 (syntax)、语义学 (semantics) 和语用学 (pragmatics) 这三大领域。我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韩礼德 (Michael Halliday) 也从符号学角度研究母语习得。按照他的解释，我们对现实的理解离不开将现实编成代码的语义系统，这意味着社会现实(文化)本身就是一幢富含意义的大厦——一种符号学的建构。为此，韩礼德把文本、文本种类、代码、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结构作为他符号学语言理论的研究层面。

以上是关于语言学与符号学之关系的四种观点，其中语言学包容符号学和语言学与符号学互不相干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这里就不再多谈。剩下的两种关系现在仍各有许多鼓吹者，而且双方都固执己见，一直争吵不休。我认为，如果抛开派别情绪作一番冷静的思考，将语言学与符号学看成相互交叉的平行学科的观点更有道理。按照索绪尔上面引文中的解释：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这个定义虽然缺乏十分明确的外延，但却揭示了符号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符号意指活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说来，符号可以分成两大类，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音乐符号、绘画符号、建筑符号、行为符号等等。因为意指现象几乎无所不在，许多理论家认为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与所有的文化现象相等” (coextensive with the whole range of cultural phenomena)。如果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

得到的是下面这幅现代符号学版图（图1）：迪利（John Deely）：《符号学前沿》，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xii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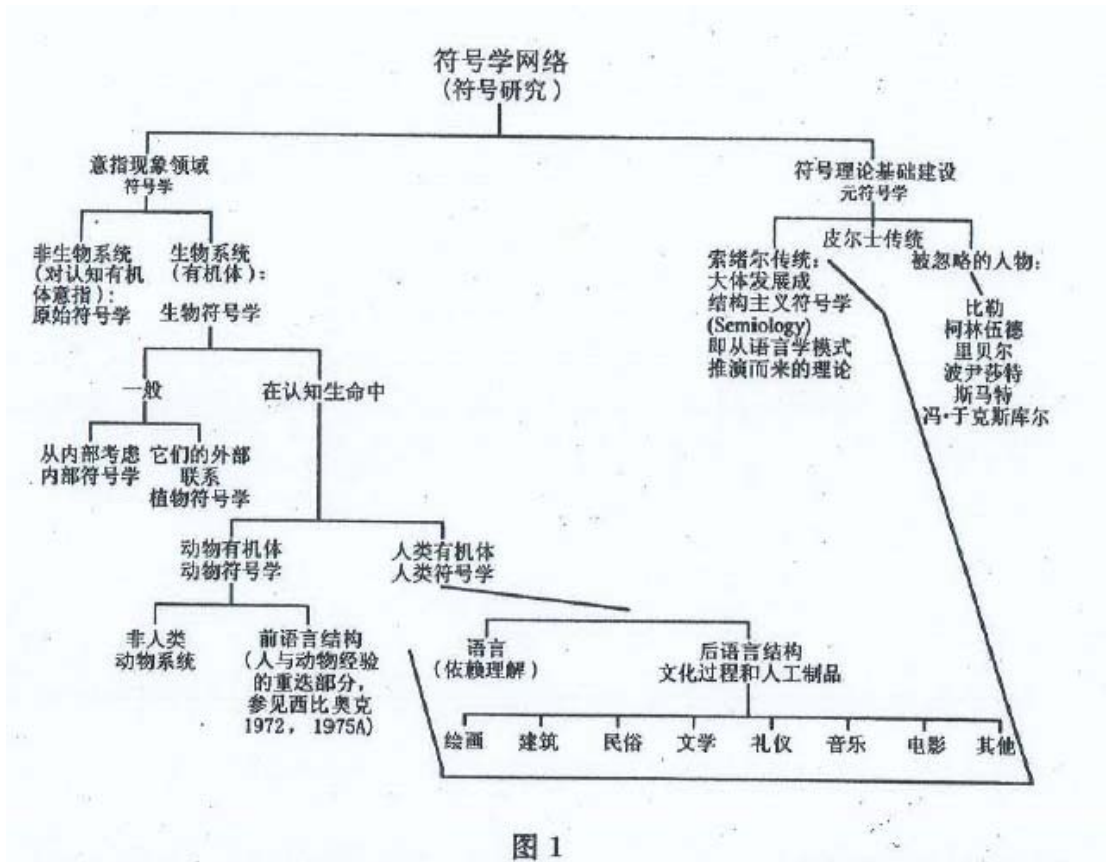


图 1

从表面上看，符号学似乎是下属众多学科的总和。一切自然与文化符号都可能成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也受到其他学科的专门关注：语言学研究语言符号；音乐学研究音乐符号；建筑学研究建筑符号；行为科学研究身体语言等。但符号学并不等于语言学加音乐学加建筑学加行为科学……事实上，它与这些学科既有重叠，又有差别。例如，语言中的词和句充当意义的载体，它们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也是符号学关心的对象之一；单纯的音素及其组合虽然是语言学的合法考察内容，但符号学对此不一定感兴趣。可见我们不应该把符号学简单地看成语言学的上级学科，它是莫里斯所说的“一种跨学科的事业”（an interdisciplinary enterprise）。莫里斯，“符号与行为”，伊尼斯编：《符号学文选》，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由此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符号学的意义何在？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进行符号学研究？要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符号学放到整个现代学术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学术思想迈入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文化知识领域的迅速扩展和深入，希望同时把握全部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显得越来越不可能或不切实际。换句话说，现代生活的形态要求人类对智力劳动进行细致的分工，这一分工作具体表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不断分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的专门化当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学科与学科之间各行其是，互不相干。有时在甲领域争吵不休的问题，在乙领域却早有被大家所普遍接受的社团共识。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自然会造成不必要的劳动重复和资源浪费。面对这一“过分专门化”

(overspecialization) 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刻感到跨学科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符号学就是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有效策略之一，它将一切形态的符号意指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或观察角度，力求恢复学科与学科、理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出自现代知识结构的需要。正如李幼蒸先生所指出：“人们既要更准确地把握对象，因而将其加以解剖，同时又要加强对各相关对象之间关联的把握。这一过程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一致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谓跨学科现象，无非是出于研究精确化的需要，对现有研究手段(诸学科方法)不断加以调配组合，综合运用，以扩大和增细对对象的描述。符号学研究的跨学科特点首先指将各种传统的研究对象加以微观化和系统化的倾向”。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7 页。